◎作家近况

张柠：记录“80后”的精神成长

本报记者　**张鹏禹**

1993年2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九宿舍625室，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和张柠等人在畅谈文学遭遇到的危机。这次寝室中的对话就是后来被收入多种当代文学批评选的那篇著名论文《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张柠也开始以批评家的身份走入中国当代文坛。25年后，他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三城记》。甫一问世便引起了大家的好奇，他的小说语言会不会像文学评论一样理性十足？小说研究的功底能帮上创作的忙吗？

将笔触延展到广袤的天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左手理论、右手创作的大家不胜枚举，鲁郭茅巴老曹都是精通文学批评的杰出作家。然而在今天，作家与学者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分明，以至于学者写小说一时成为文坛新闻。近年来，吴亮的《朝霞》、李陀的《无名指》、於可训的《地老天荒》等长篇小说的出版似乎掀起了一股知识分子创作热潮。

在张柠看来，这种现象不足为怪：“我觉得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有两种：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写评论主要靠逻辑思维，而文学创作需要调动形象思维。一个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双屏手机，可以互相切换。”尽管二者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张柠却可以没有障碍地自由转换。“学术思维逻辑性强，同时还要准备材料，泡图书馆，坐冷板登，最后通过论证得出结论。而在文学创作时，场景、人物、动作、画面等等会不断在我大脑中出现，接着我会把这些转化为一种比较合适的文学语言在纸上或电脑上呈现出来。”

虽然两种思维、两种身份有方方面面的区别，但却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作者与叙述者思想背景、语言表达、情态口吻的接近，对于初次尝试长篇小说写作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更便捷、也更容易抵达真实。《三城记》以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大学校园、报社、文化沙龙等为叙述场域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张柠并不满足于此。“不是说不能写自己熟悉的人物、环境、身边发生的故事，仅仅写这些是不够的，一切要以人物性格的展开、故事的推进为准则。”张柠说。他写了大学校园、报社、文化沙龙，更将笔触延展到广袤的天地中，“我的主人公要在哪里生活，我就必须选哪个地方写。顾明笛身上有一种不断探索、寻找、突破现状的精神特质，对外界有好奇心。因此我写到了他到草原采访、到农村体验生活、到工人夜校给工友补习等很多象牙塔之外的生活。”

知识分子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往往希望借助人物表达看法，发表议论，而处理不好则会造成小说语言异化成学术语言，让读者“出戏”，影响阅读体验。“为什么有人把评论家写小说当作贬义词？原因就在于观念先行、议论太多，人物和作者是两张皮、一张嘴，人物成了作者的传声筒”，张柠说，“鲁迅的《呐喊》《彷徨》，杨绛的《洗澡》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这些大学问家的小说里都有议论，但却没有掉书袋子的感觉。”

张柠简介：作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等。

为了克服这一学者型作家常出现的问题，张柠把重点放在表现人物行动上。批评家贺绍俊认为：“小说中的乌先生提出一个‘行动哲学’，他主张，关键是要有行动，要去做。这个行动哲学一下子把顾明笛征服了。乌先生的观念里有作家的影子。”

克制抢人物话筒的冲动才能做到这一点。“写作时首先要把学者身份放弃，让人物占据你的大脑，通过智慧性的话语和人物的动作、性格来呈现，而不是议论，而不是说自己的”，张柠说，“有时为了塑造人物形象，需要讨论一些深奥的问题，但不能有学究气。比如我把德国留学回来的哲学博士卫德翔谈什么是哲学那段话，转化为普通的口语说出来，不懂哲学的人也能看懂。”

《三城记》写了很多知识群体之外的人物，这缘于张柠对知识与智慧的不同看法。小说可以通过写知识群体传递知识，但真正的智慧并不完全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张柠认为，“有知识不意味着有智慧，很多民间人物更有智慧。你看工友夜校的农民聊天，谈到为什么强忍着乡愁留在城市？为什么最终还是要回家去？死后葬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跟爷爷奶奶、父母亲葬在一起？我写那部分写得自己都哭了。”

顾明笛到工友夜校和农民工聊天后，“被工友们叙述中的深厚情感打动了，又被他们貌似日常实则充满形而上品质的语言惊呆了。它不安中有沉着的一面，质朴中有深情的抒发，戏谑的腔调背后包含着严肃问题，比如生存困境和死亡焦虑。”这不仅是顾明笛的感受，也是张柠的感受。

描画当下青年不同的精神侧面

青年历来是文学家关注的焦点。《沉沦》中的“我”，子君、涓生、高觉新兄弟、林道静、梁生宝、孙少平兄弟等人物组成的青年形象谱系更成为时代的缩影，定格在文学史中。近年来，涂自强、陈金芳、张展等生动呈现出社会转型期青年一代的苦闷、彷徨、执著与探索。青年走在时代的前列，最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脉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写青年就是写时代。在这一点上，张柠的《三城记》与这些作品一脉相承，共同描画当下青年不同的精神侧面。

主人公顾明笛出生于上海的小康之家，作为一个典型的“80后”，他们这代大城市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早已解决了温饱，占据心灵的首要问题是精神问题。“顾明笛是当下中国城市青年的一类典型。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兄弟那种‘逆袭式’的人物不同，他的目标不是世俗的成功。考上大学，拿下一个博士学位，有一个城镇户口、稳定的工作，或者去赚钱，这些对他都不重要，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有一种对完美人格的想象，他追求的不是外在的价值。”张柠这样评价自己笔下的人物。

小说开篇即讲到了顾明笛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他不安于在公园管理处浑浑噩噩混日子，而是醉心于文学创作。尔后又发现创作遭遇到难以逾越的瓶颈，于是北上京城投身媒体行业，去了解广阔的社会生活。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对象牙塔内的生活重燃向往，而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一片净土，书斋生活亦充斥着虚伪，由此遭遇精神危机。之后南下广州，体验到岭南城市生活的活色生香。可以看到，顾明笛的游历，背后的推动力并不是个人事业的追求或两性情感的羁绊，而是寻找自我的冲动。

“这一代青年在寻找自我。顾明笛作为其中的代表，一直在想象自己应该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我想反映出他追求完美的过程和过程背后强烈的自我意识，后者是他人生轨迹变化背后的推动力”，张柠说，“不表现出这些，很多人就不理解，你在上海好好的，有房子又有工作，为什么要辞职？”

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顾明笛经历了中国最重要的三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在这里，他看不同的风景，经历各种各样的事，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遭遇可期或无望的爱情。这成为很多人把《三城记》看作成长小说的原因。正如张柠所说：“我是把《三城记》当作“80后”的精神成长史来写的。”

经历了这一切的顾明笛真正成长起来了吗？“顾明笛作为巨婴出现，经过上海、北京、广州，最后成长为健壮、健全的人，他离开了母亲，从一个‘妈宝男’走向民间、人民和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个能够和整个火热的时代形成某种关系的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评价说。

不过，顾明笛身上的“巨婴”特点也使他的成长受限。“顾明笛像一个巨婴，导致他最后几乎没有成长的原因是他没有遇到过大奸大恶，也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陷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顾建平说。

作家徐则臣认为：“顾明笛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多余人’，在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时候会选择逃避。”

这种逃避性正是张柠心中理想型人格的特质之一。“顾明笛的性格自始至终有一种逃避性，他倾向于回归土地，动不动就钻进睡袋，土地、睡袋是子宫的隐喻。他身上具有一种返回母体的冲动，而这正是理想型人格的特征。无论是屈原、陶渊明，还是贾宝玉、顾明笛，潜意识里都有这种因素。”

或许，人物背后的反思力量与勇于行动的精神更为难能可贵。一句话，成长的过程比成长的结果更重要。

张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孩子与战争

——简评小说《泥土里的想念》

纳　杨

一部小说，如果能够写出一个相对完整、可信可感却又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世界，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那么这部小说就是成功的。读宋安娜的小说《泥土里的想念》，就有一下子被吸引进去的感觉，猝不及防，我就这样跌进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天津英租界。

整个小说的故事就建立在8岁的犹太小女孩撒拉对照顾她生活起居的保姆“阿妈”的情感依恋之上。随着撒拉与阿妈的合与分这一主线的行进，日本军队侵占天津的那段历史也徐徐上演。从有阿妈的朝夕陪伴，到“丢了”阿妈，再到寻找阿妈，最后与阿妈相见却不能相认，小女孩撒拉真真切切地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也深深体会到被迫与亲人诀别的痛苦。

孩子与战争，这是一组极有冲击力的搭配。但在这部小说里，孩子不再是表现战争的“道具”，战争被放置在孩子的背后。小说的着力点总是放在孩子的情感状态上。日军进入天津之前，撒拉与胡同里的小伙伴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日军进入天津之后，生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英国向日本宣战后，日军进入英租界当街抓人、强占学校，撒拉的生活被彻底改变，身边熟悉的人开始离开，有的被驱逐出租界，有的“上山”，有的被日军杀害。小说尽量把撒拉所看到、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让读者跟随小撒拉一起，仿佛也经历了那场战争，在天津的英租界里活了一回。

时间就像长河，小说所写的只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但作者用大量细节填充这朵浪花的每一个细胞，让这朵浪花发出显微镜一样的功效，放大了1937年到1942年的天津英租界，让我们得以看见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真实存在着的那些在天津生活的犹太人。他们保持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在英租界形成了一个犹太社区。战争到来之前，他们与英租界的中国人友好相处。战争爆发后，他们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也尽力接收从欧洲和中国东北逃到天津的犹太难民。直到日军进入英租界，天津也不再是他们停留的港湾，他们只得再次背井离乡，寻找安身之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天津英租界的犹太社区的小撒拉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战争敌人之来势汹汹，也能感受到联手反抗的积极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70多年了，世界各国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反战题材作品，其中有一些人物形象已经成为经典。我国的抗日战争题材作品也很多，但真正能把对战争的思考放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大格局上的并不多。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有这样的野心和气势的。

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天津风土民俗的描写，对天津老城的描写。而对犹太人的描写也比较传神。而让小撒拉深深依恋的阿妈，是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温柔善良、勤劳能干，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手下有做不完的精美手工，传统文化在她这里自然地传承。更可贵的是她并没有仅仅把当保姆作为谋生的职业，而是对照看的孩子付出真情。阿妈只是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一个代表。善良之人却被肆意伤害，更加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忍可恨。

小说聚焦抗战时期天津犹太人这一鲜为人知的群体，写出了一段较为真实可信的历史，对于提升我们对战争的认识和反思有着积极的意义。

宋安娜著
新蕾出版社出版

诗歌与我们在一起

杨　鸥

中国第一个诗人小镇，坐落在浙江省浦江县大畈乡上河村，依山傍水，粉墙黛瓦的建筑，入口处的墙上是谢冕先生题写的“中国诗人小镇”字样。在这里，由中国诗歌学会举办的第三届“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日前举行。“通过这个活动呈现出一个古老民族的社会关怀没有缺位，这个活动是全体诗人共同书写的人类最美好的一首诗。”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说。

2016年浦江全社会上下搜救3个走失的儿童，被称为“216联合搜救行动”。中国诗歌学会就此发起了“我们与你在一起”诗歌公益活动，旨在通过浦江，向全中国彰显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大爱的，是需要大爱的。3年来，“我们与你在一起”诗歌公益活动在浦江举办了3届，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诗人们将笔触转向了留守儿童、老人，并动员全社会来关爱他们，引发了诗歌+公益+力量的新时尚。第三届“我们与你在一起”诗歌公益活动共征集诗稿4322首，13首作品获奖。本次活动的“星光奖”颁给了自掏腰包买菜给贫困学生做饭的江西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黄泥小学校长章站亮。

2018中国诗歌年度报告在此间发布，黄怒波指出：“诗歌应该切近社会现实，切近重大主题。”他认为，诗歌在对民族心灵的修复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新诗是在民族危亡时刻出现的，与民族共患难，在新诗百年之后，新诗往哪里去？中国诗歌学会推出中国诗歌年度报告，用不同学者的眼光判断一年中诗歌的走向，记录中国诗歌每年的重大事件和特征，是要用中国人的声音讲中国的诗歌故事。世界需要通过诗歌这个媒介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诗歌，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浦江县的诗人小镇

2018中国诗歌年度报告撰写人、诗评家耿占春指出，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从1978年至2018年，很多诗歌问题都与时代、社会相联系。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朦胧诗2018年在很多大众场合朗诵，已经不再“朦胧”，显示出中国社会的语言感受力有非常大的进步，诗歌写作介入了改革开放，参与了当下的时代进程，应该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的眼光看待诗歌。

中国诗歌年度报告自2017年起以年度为单位编撰，定期发布。除中文版外，其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韩文版等多语种的版本相继在世界各国发布。

用文学为曹妃甸立传

杨立元　孙　溢

曹妃甸有着丰富历史内蕴、丰厚文化积淀和现代化元素。曹妃甸人在这里创造了现代版的“精卫填海”，使得广袤滩涂和海中孤岛变成了一个现代化世界大港和现代化滨海新城。曹妃甸作家被曹妃甸“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大变化所鼓舞和感染，用作品激情描绘曹妃甸创业发展的恢宏进程和深情讴歌建设者科学决策和奋斗精神。

曹妃甸文学是曹妃甸发展建设的文化呈现和诗性表达。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曾在曹妃甸的农村和机关挂职，在这里开创了“雪莲湾系列”和“平原系列”。报告文学家王立新在这里写出了气势恢宏的“海湾三部曲”（《曹妃甸》《首钢大搬迁》《大海上的钢城》）。还有孙武勋的诗歌集《海韵诗稿》《海韵歌吟》，孙梦成的散文集《水乡清韵》《双龙河畔》，刘兰朝、孙梦成的长篇小说《大唐曹妃》，朱永远、刘玉相的长篇小说《曹妃甸长歌》、李庆玺的散文集《乡韵诗情》《史话曹妃故里》，郑春雷的诗文集《爱上曹妃甸》，付秀宏的散文集《行游曹妃甸》，等等，都表现出了回顾历史、关注现实、拥抱生活、反映时代的创作精神。曹妃甸的建设和发展，就是当下变革的社会的缩影。作品除了正面描写建设中的曹妃甸，同时还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所以，它是立体的、厚重的。

曹妃甸文学中有着浓郁的历史色彩和强烈的现实精神。《大唐曹妃》和《曹妃甸长歌》将传说与史料巧妙结合，虚实相间，反映了曹妃甸的千年历史，给曹妃塑像，并深刻地揭示这一形象所负载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王立新的长篇报告文学《曹妃甸》以深厚的历史容量、鲜明的时代精神表现了曹妃甸开发建设的伟大历程，真实地再现了曹妃甸建设者锲而不舍、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彰显了曹妃甸所焕发出来的现代工业迅猛发展的勃勃生机，昭示着新时代赋予曹妃甸精神的崭新意义。这样，曹妃甸文学做到了文学与史学的合一，理性与诗性的融汇。

曹妃甸作家把家国情怀与故乡情愫融为一体。如孙梦成的散文集《双龙河畔》布满了故乡元素和家族脉落，显示了作者家园之恋和亲情之美。孙武勋用诗美化家乡、诗化祖国。他的《沁园春·甲午秋日登曹妃甸》从历史和现实相观照的高度，气势雄壮、开合自如地写出了曹妃甸前世今生以及奔涌喷张的开发建设场景，折射出争做河北第一增长极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排头兵的气魄与张力。

曹妃甸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了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契合，诗性和人性的统一，因而有了较高的质量和品位。如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纸门》描写了雪莲湾人为了雪莲湾的圣洁和进步而虔诚守候和积极开拓。正是这些人物的奋斗牺牲和与世俗的不懈斗争，才实现了雪莲湾社会主义新渔村的和谐进步。王立新的《首钢大搬迁》被人称为是一部“具体而又生动地反映首钢人一诺千金精神的沉实和厚重的作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现代工业史诗”。

曹妃甸作家十分注意从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中学习、汲取有益的成分，在写作技法的运用上做到了古典和现代的有机结合，使得作品呈现出多样的色彩。如孙武勋的诗歌以其典雅厚重的韵味形成了浑然天成、和谐自然的美学品格，并流溢出纯净平和的神韵，感人至深的情韵，深刻厚重的意韵，自然朴素的美韵。孙梦成的诗集《左古典　右现代》表现出了作者使用古典和现代多种写作技法的稔熟，在创作中也显露出壮美和优美两种美学风格。关仁山在小说创作中也充分运用了传统和现代手法。他的“雪莲湾系列”颇有传奇小说色彩，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写法的同时，还运用了黑色幽默、象征和隐喻等现代派手法，使得小说意蕴深厚、意味深长。